

城市景观视野下的上海棚户区变迁及社会文化心态*

吴俊范

摘要：城市景观的记忆、感知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心态机制，是城市人文地理学、城市史学、城市社会心理学、城市文化遗产学等共同关注的课题，但由于跨学科方法的交融不够，少有成果真正将城市景观作为一种有历史含量的地理现象，认真地复原其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并将景观史与现实社会心态有机地联系起来，以致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全面性与科学性。文章采用跨学科方法，在这一课题上有所创新和突破：首先，以历史地理学方法复原了上海棚户区景观的演变历程；其次，运用凯文·林奇的意象调查方法统计了今天上海人对棚户区的文化感知状态；最后分析上海棚户区的景观演变在现实社会中的心态效应。

关键词：上海；棚户区；景观史；意象调查；社会心态

Abstract: The memory, sense of urban landscape and the relative social psychology, have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ers of urban anthropogeography, urban history and urban sociology, but for the lack of intersectional method, few fruits really relate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landscape evolution with the social psychology in practical world, so that the scientific value of the conclusion is reduced.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some breakthrough by using the intersectional method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Kevin Lynch's image space. First, this paper rebuilds the geographical change of the Shanghai shanty settlement. Then, analyses the historical image of it by collecting data from fieldwork. Finally it get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squatter settlement and its residents has entered deeply into Shanghai culture.

Key words: Shanghai; shanty settlement; landscape evolution; image of city; social psychology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 (2012) -01-36 (7)

作者简介

吴俊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员，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后，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景观的记忆、感知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心态机制，是人文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文化遗产保护等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学者在各自学科范畴内所做的探讨已蔚为大观，但在跨学科理念的运用和综合研究方法探索方面显然不够。

例如，在城市景观感知方面，以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凯文·林奇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意象调查方法影响较大。他以道路、区域、边界、节点、标志物为五个基本要素，要求受访者用点、线、面形式描绘出城市景观的意象地图，然后从中分析不同社会属性的居民对周围城市景观的心理印象和文化评价。林奇通过直观的图形方式，减少了使用语言表述心态感知时的主观性，具有更强的资料客观性，因而受到人文地理学者的借鉴和模仿，并产生了大量城市景观地理方面的学术成果。但因为林奇作为具有地理学素养的城市规划学家，并不习惯以历史变迁的视角来观察研究对象，故而该方法暴露出了明显的缺陷，即：由意象地图切入而分析受访人对环境的心理感知时，林奇只注重受访者现有的社会属性和文化素质，例如学历、职业、年龄等要素对其心态的影响，而不注意景观演变的历史过程对受访者文化认识的叠加性渗透，也忽略了人们对历史知识把握的程度本身就存在差异。举例来说，一个只有10年演变史的景观对象，与一个已有100年演变史的景观对象，在同一感知主体的心理认知层面绝对存在着文化意象的差异；而一个在城市里生活5年的人，与在同一座城市里已经生活了50年的人，对城市景观的认识也不会是相同的。总之，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ZONGHE003）、上海市哲学社科规划项目（2009BLS002）、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共同资助。

林奇的分析模式虽然充分考虑了景观的地理性与可感知性,却忽略了景观的历史性与文化叠加性,因此还需要在景观感知的跨学科研究方面做出更多的探索与改进。

本文选择近代以来上海城市聚落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棚户区作为研究对象,在充分考虑其历史性、地理性、可感知性的基础上,开展景观感知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将棚户区作为一种有历史含量的地理现象,客观复原其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其次,运用凯文·林奇的意象调查方法,统计今天上海人对棚户区的文化感知状态;最后综合分析上海棚户区的景观演变史在现实社会中的心态效应。

1 上海棚户区的景观史及其边缘化特征

棚户区属于近代以来上海城市聚落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地理空间变化来看,棚户区的原始形式,是上海开埠后出现在城乡交错带的外来贫穷人口的聚居区,之后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棚户区也向周边呈现出快速扩散之势。至1949年为止,上海城市中心区已完全被数百处规模不等的棚户区所包围,大约有1/4的城市人口生活在棚户区内。建国后,随着城市户籍政策的紧缩,上海流动人口减少,棚户区扩散一度得到控制,基本处于静止状态。1980年后,随着城市空间再度大规模扩张,棚户区逐渐被分割包围在新的城市区域内。1990年至今,政府加大对棚户区的改造力度,延续了100余年的棚户区景观形态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纵向来看,棚户区景观的空间分布经历了从城乡交错带—市区边缘—市区范围内—大规模改造拆迁—居民重新被安置在市区边缘的变化历程。

根据史实进一步分析,棚户区景观形成和早期演变的驱动因素中,既有人文因素,也有自然因素,而建国后棚户区景观的发展演变,则更多地是政治、经济等人文因素的作用。

上海开埠后,近代化的城市土地利用方式改变了原有的乡村景观格局。随着租界城市空间不断向乡村地区扩张,乡村聚落所依存的河道体系因经济价值发生转变,从而在物质形态上被瓦解。地产商越过租界线,在附近乡村地区购置土地,开发房地产,修筑马路,是早期上海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重要方式。在此地区,由于农民转让农田的顺序参差不齐,紧邻农田的河道也随之出现了利用价值的差异。先售出土地的相邻河道先失去

了农业价值,而大部分未售出土地相邻的河道仍需保持原来的形态和传统价值,但却与城市地产商的河道利用方式相互冲突。当时城市地产业正在快速向农田地区推进,官方又没有成熟的管理经验可循,于是城市外围的河道系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淤塞阻断等问题。^[1]乡村生态环境逐渐变化,城市又能提供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便吸引周边乡村的农民进城谋生^[2],那么河道体系的重要性自然渐被忽略,其完整性也更难维持。当城市空间扩张到一定程度,周边乡村的河道正在失去农田水利价值,而地产商又未加以规范性的开发利用之时,河道体系之管理即从传统的严密走向社会转型期的松懈,造成一个变化中的管理空档期。将淤未淤、欲治不治的河道与堤岸空间,为大量来城市谋生的外来贫困人口提供了最初落脚的场所,这正是棚户区起源的自然环境基础。

由河道淤塞而引起的乡村风水形势的转变,也对棚户区的扩散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风水观念在乡村精神文化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随着城市空间向周边蔓延,河道或被填塞,或被阻断,或已淤积,潮汐不通的大局,等于把环绕坟地的活水变成了死水,原来许多家族处心积虑构建起来的风水形势不复存在。较之于一般农田而言,坟地及其周围的空地,都属于产出率有限的低收益土地,可为外来贫困人口提供更为廉价、支付得起的居住用地。外来的贫苦人“或联合向地主立约租赁,或由地主允其结庐,随便纳若干之租费”^[3]。有的甚至直接被占用,而业主则懒得管理。在20世纪30年代,居住在沪西小沙渡一带乡村边缘的贫苦人,每月付一元左右的地租,即可租得一方丈的地皮,来搭建自己的棚屋^[4],这比在市区租房要便宜得多。人力车夫通常几家合租一块地皮,每月只需付几角钱的地租^[5]。部分外来户还有可能租到条件稍好一些的“祭田”或“祠田”来建造私房。祭田是族中的公产,一般委托给有能力的族人经营租佃之事,但遇到私心严重的“不屑子孙”,也常常出现经营不善,田产被变卖的结局,“非特田不可问,即祠宇亦变迁,仅余颓垣芜壤”。当时在城市空间扩张的步步进逼之下,风水形势发生变化,祭田的管理日渐松懈,族中管事的人往往变卖或低价出租祭田以获利。由于风水田本属族中公地,又不便大张旗鼓地变卖或出租,“租额大都较轻”,正常年份也就“三至五斗”或折合成相应的金钱^①,这也给棚户区的扩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在自然—人文环境交互变化的条件下，早期棚户区在城乡结合部的夹缝里产生并逐步扩展，具有显著的区位边缘化特征。其占用的河浜、堤岸、风水田等物质空间，均属于低收益的土地，甚至河浜、堤岸之类传统上不被列入常规的土地资源。低成本的生存资源成就了早期的棚户区，也为其后来在整体城市空间中的边缘化地位埋下了伏笔。在棚户区规模基本成型的20世纪30、40年代，棚户区由于景观破败而一度被认为是城市的病灶，成为政府强制拆除的对象。即使政府规划少量的平民村住宅来安置棚户区人口，也一般是利用郊区的廉价土地，而且由于阻力重重难以真正付诸实施^②。1949年后，由于土地私有制被取缔，棚户区失去了空间扩张的条件，这时棚户区人口密度反而增大。据陈映芳2003年对棚户区数百户居民的访谈记录，20世纪50、60年代上海的公房资源非常紧张，原来蜗居在一间公房里的家庭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多转向棚户区购买平房，自己再加以翻造^③。不过这时由于棚户区不再向外围扩张，逐渐被包裹在有所扩大的市区范围之内。从城市版图上，棚户区似乎融入了整体城市空间，甚至成为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与廉价土地紧密相联的演变史，居民文化水平的单一与停滞，仍然可通过其拥挤、杂乱、缺乏规划的景观外表得到明显体现。

棚户区人口结构的演变也体现了明显的社会边缘化或弱势群体的特征。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许多本地的农村人在城市就业，空出的农田为外来贫民提供了临时的生存资源。他们在家乡就以种田为生，来沪后没有别的技能，租田来种倒是较好的生路。据1949年10月份上海市政府对8 239户棚户区的职业调查，在附近村庄种田的共有2 291户，占总户数的1/4强^④。除从事农业外，民国时期棚户区人群另一个最为显著的职业特点就是临时工数量多，缺乏稳定性。根据民国不同时间的棚户区人口职业统计，人力车夫、临时雇工一般占有较大比例，其次是小商小贩、小手艺人，还有部分无业者。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重点发展工业，同时着力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棚户区人群的职业结构开始趋向稳定，其主体集中在工人阶层。但建国后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也不像舆论宣传的那样理想化。新政权虽然在改善工人生活水平尤其是居住条件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但由于当时社会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新的社会秩序下又百废待兴，所以工人就业和居

住等重要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甚至会出现迂回曲折、时有下降的局面。根据2003年陈映芳所组织的上海棚户区居民口述史调查进行统计分析，许多棚户区居民在建国初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找了数次工作，最后才找到里弄生产组的岗位，其工资和福利待遇却都不能与国营工厂的工人相比；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父辈的里弄工人身份又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子女后来的就业走向。除此之外，还有相当部分家庭妇女一直无业，即使大跃进期间参加了集体劳动，运动过后却又恢复了家庭妇女的身份^⑤。也就是说，棚户区居民延续下来的边缘化社会身份在建国初期有所改善，但没有根本的变化。

1978年至今，我国经济体制处于改革进程中，棚户区人口的生存手段和相关社会身份再次发生变化。身份变化最明显的是现今40~50年龄段的棚户区人口，由于企业体制转轨和市场的变化，他们大多数在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转而自谋职业。其中许多人当初就业时系接替父辈岗位，又经历过上山下乡插队劳动的知青生涯，所以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致使下岗后很难找到较高薪酬的职业，再就业领域以服务行业为主。

2 针对棚户区景观史的社会心态调查

关于今天上海人^⑥对于棚户区景观及其边缘化特征的社会文化认知，并非用“歧视”一词可以简单概括。“歧视城市弱势群体”之类的评价，根本难以反映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空间的上海人对于棚户区或深刻、或肤浅、或直白、或隐讳的内心评判；有人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感知看法与内心的真实感知可能相差甚远；有人口头上表示没有歧视棚户区的心理，而行为或者处事方式却大相径庭。更为重要的是，棚户区景观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文化特征，必然在不同代际的上海人意识中留下历史的印痕，今天人们对棚户区景观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层累的结果，但人们在言谈中却很难理性地将历史影响与现实影响进行分层。所有这些，都要求研究者在社会心态的调查手段上尽量做到科学，尽量减少语言引导的主观性，加强对受访者潜意识的挖掘，加强对调查得来的历史信息与现实信息的分离和提取。

为全面科学地获取上海人对于棚户区景观的文化认知信息，本文采用了凯文·林奇意象调查方法的基本模式。例如，要求受访者用点、线、面绘制棚户区的意象地图，并通过意象地图透视绘图者的潜在文化心理。但

林奇模式过于注重景观的现实形象,忽略了景观的历史含量在受访者心态中的作用,故笔者在设计问卷选择题时,有意加重了棚户区历史演变的题目,通过选择答案的比对,来分析棚户区景观史对今天受访者心态的影响方式。

进行城市社会心态的调查研究,对样本的数量与属性分布都有很高的要求,应当兼顾到社会各个阶层。但鉴于本文是笔者对城市景观史与心态文化关系的一个新尝试,具有探索的性质,因此无论从精力上还是从研究经验上都无法选择大批量的复杂样本。本文所运用的是带有一定倾向性的小样本,主要目的是为此新方法的改进积累经验。而对其他市民阶层的调查也正在开展,假以时日,其分析成果便可与本文结论相互参补。本次小样本调查在选择样本时尽量考虑了以下因素:

(1) 棚户区演变的主要历史过程与受访群体所生活的时代应有一定的时间距离,因为一种景观从不断变化的物质形态上升到更高层面的文化记忆,必须经过时间的沉淀,这不仅有益于各种文化认知的叠加和积累,而且也有利于认知主体在经过时间洗练后形成更加客观的评判态度。为使“历史距离”最大化,本研究特别选择在上海生活的、同时又有足够理性认知能力的年轻一代作为访问对象,即今天上海的在校大学生或者研究生。该群体具有较强的心理表达能力和地图绘制能力,也是先期选择他们进行尝试性访问的一个因素。

(2) 棚户区具有长时段的演变史,今人对它的意象认知受到多种知识来源的影响,例如主体对景观的直接观察、别人的认知与评价、媒体宣传导向、文化潮流、学术研究成果、对历史现象认知和评判的能力等,其中受访者的历史学素养和对城市本身文化积淀的感知程度,可能影响的权重更大。但这也只是一种调查前的假设,笔者在选择访问对象时有意向历史专业和文化专业的学生倾斜,究竟调查结果能否支持该假设,尚待分析结果方可确定。

此次访问对象专业的分布,

主要有两大主体,即历史专业22人,编辑出版专业24人,其他则是在某所大学里随机抽样,包括产业经济专业1人,电子政务专业8人,国际关系专业4人,机电设计专业1人,中国哲学专业1人,小学教育专业1人,数学教育专业1人,化学专业1人,共计64人。

(3) 毋庸置疑,城市文化积淀与城市景观的历史对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本地人影响更为明显,所以本次访问样本中大部分为上海籍大学生(计35人),他们有更多的理由对棚户区意象发表见解。但外地籍学生的看法也很重要,因为在上海生活的外地人是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景观的文化心态,不仅是城市整体社会心态的组成部分,也可与上海人的心态状况形成对比。本次调查中有外地籍大学生样本29个。

3 棚户区景观史的社会心态效应分析

3.1 棚户区意象空间的整合与分析

在本次调查进行期间(2008年12月-2009年2月),上海市政府正在加大棚户区改造的力度,传统形态的棚户区即将成为历史的一页,但这并未影响到受访者对棚户区今日与往日的清晰认知。将收集到的64份意象地图中的所有要素分类统计,并将出现频次超过2次的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五种要素,按照原图指示的位置,分别定位在今上海市区简图上,得到图1。图中灰色区域代表棚户区的意象空间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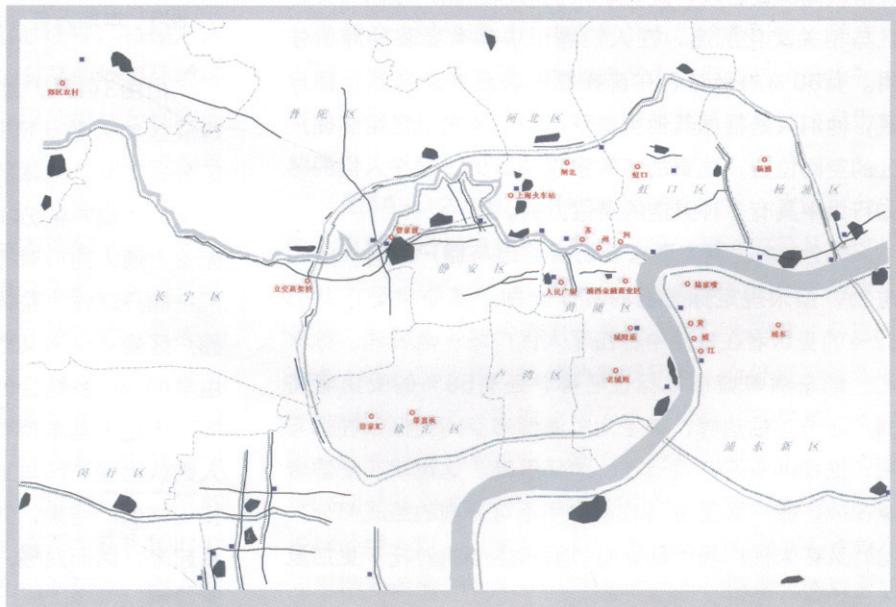


图1 2009年上海市棚户区意象空间分布示意图



图2 2000年上海市棚户区实际分布示意图

再根据2000年有关科研机构实地调查数据，绘制出截止该年度的棚户区景观实际分布图（见图2）：

将两图对照即可发现：

（1）由于样本较小，意象地图中的棚户区分布较为稀疏，但其走向与实际分布图基本一致，集中在沿苏州河、黄浦江一线、中环线附近和城市中心区边缘一带。图2与图1数据来源的时间节点虽相隔9年，且最近9年内是棚户区拆迁力度最大的时期，棚户区的实际空间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两图中棚户区分布趋势仍表现出较高的重合度，这说明人们对以往棚户区的历史记忆与相关文化沉淀，在人们意识中具有显著的滞留作用。有60%的受访者在选择题中表示未亲自到过棚户区，他们只是根据其他渠道获得的印象或记忆绘制棚户区的空间位置，这更加证实景观的历史过程在人们的感知行为中具有多种渠道的滞留方式。

（2）本次调查要求受访者绘出与棚户区有关的标志物，但未规定标志物的具体类别。其结果是，共有62%的受访者在地图中标出了人民广场、老城厢、徐家汇、陆家嘴等城市地标性名称，还有58%的受访者将棚户区分布的边界，确定为上海城市空间的框架性标志物，例如苏州河、黄浦江、中环线等。这说明在受访者意识中，棚户区是上海城市空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在人民广场、陆家嘴等城市中心的衬托下更加显示出边缘化特征。

（3）棚户区景观的历史演变进程，直接影响到今

天城市不同区域人群间的社会生态关系。图1中出现了杨浦、闸北、曹家渡、肇嘉浜等区片名称，均为近代以来棚户区分布的密集区域，这些地名均被受访者以醒目的字体标出，意味着这些区域因棚户区的存在而被烙上了特殊的文化印记。受访者对这些区域的“另眼看待”，可能直接影响城市不同人群间的社会生态关系，这也正是上海城市社会中“棚户区歧视”现象的深层心理映射。

3.2 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感知差异及其分析：

进一步分析可发现，本地人与外地人对棚户区的空间、历史、文化认知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受访者

对棚户区所处区位及其与整个城市空间关系的认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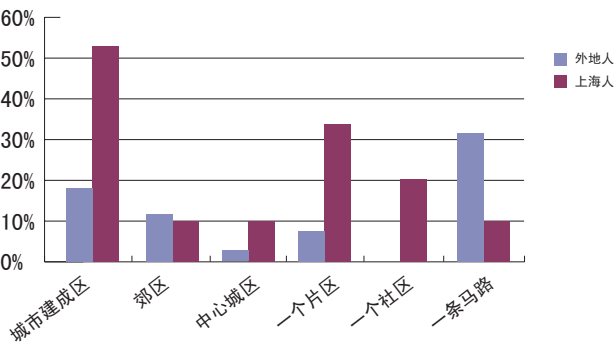


图3 本地人与外地人对棚户区意象区位的认知差异

由图3可见，上海本地人中认为棚户区分布在城市建成区的人数比例最高，达到54%。其次是认为棚户区分布在某个具体的区片或者具体的社区，而外地人则一般认为棚户区分布在某条具体的马路旁边。这说明，无论上海人内心对棚户区的文化身份如何定位，终究还是把棚户区作为整体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把棚户区景观作为某些区片或社区的代名词。对于棚户区由早期的城乡结合部向后期的城市中心区位移的历史事实，本地人基本持有清晰认识。而初到上海生活的外地人则认为棚户区与某些马路具有密切的关系，多系其直接观察到的结果，并未将棚户区分布与整体城市空间联系起来，因而对棚户区的区位感知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和零碎感。

图3也初步证明了本次调查的一个预设观点，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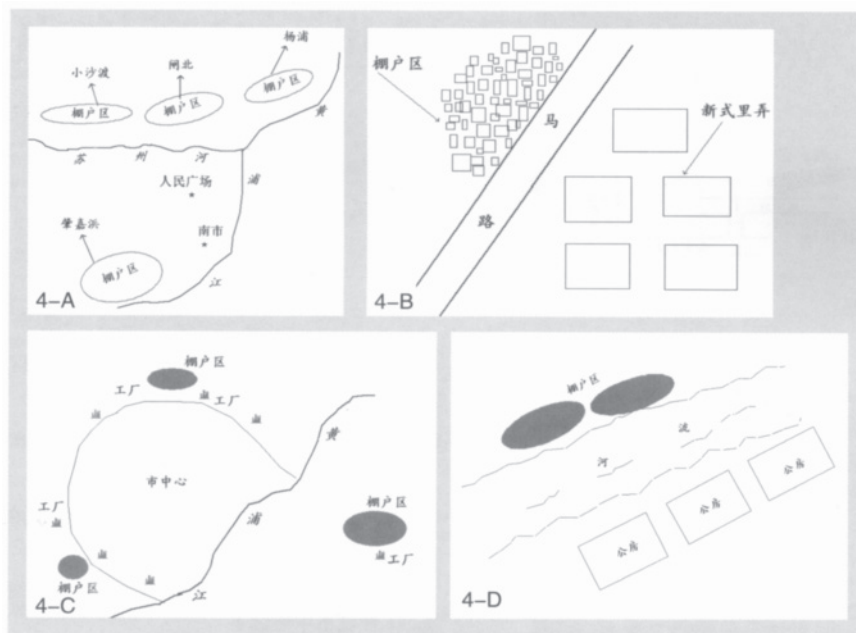


图4-A 上海籍历史专业研究生绘制的棚户区意象地图（住城市边缘区）

图4-B 上海籍历史专业本科生绘制的棚户区意象地图（住城市边缘区）

图4-C 上海籍编辑出版专业本科生绘制的棚户区意象地图（住城市中心区）

图4-D 上海籍编辑出版专业本科生绘制的棚户区意象地图（住城市中心区）

受访人在上海城市的生活经验和对城市文化积淀的感受程度，直接影响其对棚户区景观的综合感知。以下对几类典型意象地图的个别分析，则更进一步显示了本地人与外地人对棚户区边缘性社会特征的文化感知差异及其驱动因素。

图4A-D之原图均为上海籍受访者所绘，笔者以之为底图加以重新描绘。图A直接采用小沙渡、闸北、杨浦等区片名称来表示棚户区的存在，说明其作者并非就空间而论空间，而是将棚户区分布与城市区片的社会文化特征相提并论；图B则用不同的图形符号，将棚户区拥挤杂乱的居住形态与新式里弄整洁有序的外部环境区分开来，说明作者对社会分层和居住隔离等社会现实问题有深刻感受，棚户区景观不过是这些社会问题的视觉形式；图C将棚户区与市区周边的工厂区绑定在一起，说明其作者对棚户区人口的工人身份有清晰的印象；图D作者则认为棚户区与河流有空间依存关系，这表现了相当长时间内棚户区曾经具有的自然环境特征，代表早期棚户区的历史地理进程。

综合看来，上海本地人绘制的意象地图，除具有较深刻的文化内涵外，还具有一定的历史含量。例如，棚户区成为闸北等区片的代名词，是抗战以后逐渐形成的文化现象；棚户区人口与工人身份的联系，在民国时期即已凸显，建国初期达到高潮，现在仍然延续；棚户区与河道的空间依存关系，自棚户区起源时即已开始，直

至建国初期还依稀可辨，老一代上海人对此更有着直观的感受。这些历史特征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未亲历过棚户区生长过程的新一代上海人意识里却痕迹仍存，这不能不说明关于景观的历史记忆具有代际传承的功能。但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的专业背景、学历层次、居住区域与其对棚户区历史意象的认知并无必然联系。相比之下，景观演变的客观历史及其所显示的社会文化特征则更具影响力。除上述外，本地人绘制的地图也体现出其对棚户区“另眼相看”的心理，棚户区文化身份的边缘性通过图中要素的布局清晰可见。棚户区空间区位虽然基本处于中心城区内，但其与“公房”、“新式里弄”等的对比，却反衬出其文化与社会身份的边缘性。

图5A-D之原图为外地籍受访者所绘，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笼统的“随处可见”型，二是具体定位的“傍依马路”型。一般来说，外地人初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对具有定位作用的马路景观均较为留意，马路附近的一些视觉冲击力较强的景观印象，自然随同马路名称一起进入记忆。其次，对于辨不清确切方位而又可频繁见到的景观，会产生“随处可见”的错觉，这两个心理倾向性在外地籍受访者的意象地图中均有明确表现。说明外地人对上海棚户区景观的认知尚停留在简单的空间层面和表象，并未向更深层次的文化或者历史层面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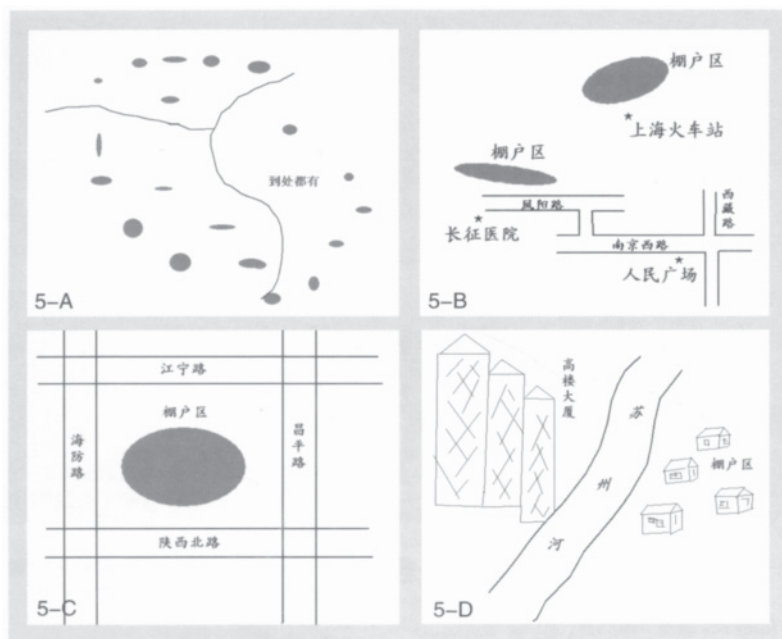


图5-A 外地籍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绘制的棚户区意象地图（住城市中心区）

图5-B 外地籍历史专业研究生绘制的棚户区意象地图（住城市中心区）

图5-C 外地籍教育学本科生绘制的棚户区意象地图（住城市中心区）

图5-D 外地籍化学本科生绘制的棚户区意象地图（住城市中心区）

通过以上两组意象地图的对比，进一步证明了城市景观史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文化内涵，对城市人群的社会心态有着长期的作用，其作用强度主要与认知主体在该城市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积淀的传承方式有直接关系，而与主体的其他社会属性，目前看来则关系不大。其次，本次调查对了解上海年轻一代对棚户区景观未来演变趋势和文化影响的心理预期，也有一定帮助。例如，图4-A的绘制者，在回答多项选择题时认为，今天上海人对棚户区人没有偏见，但绘出的地图却把棚户区分布与某些固定的区片联系起来，暗示与棚户区相关的区片文化形象已根深蒂固，上海城市的区域文化歧视现象在将来完全具有延续下去的可能性。

本个案研究是采用跨学科理念与多学科方法，对城市景观感知及其历史文化内涵所做的初步探索，可为城市史、城市地理学等领域的景观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当然，本课题的深化尚需进一步扩大样本来源和样本类别，针对不同样本设计合理的研究手段。目前对上海其他市民阶层的社会心态调查现正在进行，其综合成果无疑将会对本文结论有所完善或修正，同时也使本课题研究路径更加成熟，理念更为系统和科学。

注释：

① 转引自上海市徐汇区档案馆藏《上海县漕河泾镇人民政府土改工作队关于本镇土改计划档案征没收房屋基地使用情况调

查》，其中“漕河泾乡土地改革第一阶段计划草案”部分，卷宗号90-1-1。

② 参考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公共租界档案”，其中有关“棚户问题”部分，卷宗号U1-3-1370。

③ 参考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处编《一九四九年上海市综合统计》，其中“本市棚户难民典型调查（二）”部分，1950年7月油印非出版资料，第348页。

④ 本文中所使用“上海人”一词，指其父辈已在上海生活、本人又在上海出生并一直生活至今的市民群体。

参考文献：

- [1] 吴俊范. 开埠初期上海塘路系统的产权转型及其环境效应[M]//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99—108.
- [2] 戴鞍钢. 近代上海与周围农村[J]. 史学月刊，1994（2）：48—55.
- [3] 朱懋澄. 上海工人住屋及社会情形记略[M]. 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职工部印行，民国十五年.
- [4][5] 胡林阁.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M]. 香港：远东出版社，1939：85，598.
- [6] 陈映芳. 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7] 陈雁. “大跃进”与1950年代中国城市女性职业发展——以上海宝兴里为中心的研究[M]//复旦史学专刊第二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61—266.

责任编辑：吴年华